

新中國出土墓誌

河南 叁 千唐誌齋 壹 上册

中國文物研究所
千唐誌齋博物館 編

新中國出土墓誌

河南〔叁〕千唐誌齋〔壹〕上册

文物出版社

書名題字 啓 功
封面設計 張希廣
責任編輯 蔡 敏
責任印製 陳 傑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新中國出土墓誌. 河南卷. 3, 千唐誌齋/中國文物研究所, 千唐誌齋博物館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10-2186-4

I. 新… II. ①中…②千… III. ①墓誌-匯編-中國②墓誌-匯編-河南省 IV. K877.4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173491 號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叁〕千唐誌齋〔壹〕

編者 中國文物研究所
出版發行 千唐誌齋博物館
文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二號樓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印 刷 北京達利天成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經 銷 新 華 書 店
定 價 二〇〇八年一月第一版
九六〇圓 (上、下冊)
二〇〇八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8 印張: 89

ISBN 978-7-5010-2186-4

本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任 張柏

副主任 張廷皓 孟憲民

委員 (按姓氏筆畫順序)

王素任 昉 黃景略 郭引強 喬梁 趙跟喜

本叢書主編 王素

執行主編 任昉

特邀編審 張忱石

編輯 楊琳

本書主編 趙跟喜 張建華

編著 趙跟喜 張建華

編務 (按姓氏筆畫順序)

丁秋鳳 汪琦 李春光 馬金波 陳文學 趙靖

趙新玲 韓經權

攝影 趙靖

初審 張忱石

覆審 王素任 昉

《新中國出土墓誌》第一期工程書目（十卷十八冊）

-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壹〕（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貳〕（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參〕千唐志齋〔壹〕（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壹〕（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陝西〔貳〕（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壹〕（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壹〕（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重慶
新中國出土墓誌·江蘇〔壹〕常熟（上、下冊）
新中國出土墓誌·上海／天津

總 叙

中國文物研究所《新中國出土墓誌》整理組

《新中國出土墓誌》是中國文物研究所與全國各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單位合作編集的一部大型叢書。本叢書的編集，一直在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下進行，並得到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本叢書的出版，曾列入經國務院批准的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但由於種種原因，工作一直未能順利展開。以致遲至今日，本叢書纔得以陸續與讀者見面。

本叢書的編集，由中國文物研究所所屬文物古文獻研究部具體負責。文物古文獻研究部的前身，依次為：一九七四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成立的竹簡帛書整理組，一九七八年經國務院批准創建的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一九八三年經文化部批准改名的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在整理組階段，整理出版了《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睡虎地秦墓竹簡》等一系列重要出土文獻專著。研究室創建後，除主編不定期學術刊物《出土文獻研究》外，又從事阜陽漢簡、居延漢簡、江陵漢簡、吐魯番文書、敦煌古文獻等一系列重要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其中，歷代墓誌的整理與研究，也是本單位的一個重要出土文獻項目。

如所周知，墓誌是我國古代代理設在墓中用以記叙死者姓名、籍貫、生平及親屬世系的銘刻文獻。其形制起源於秦漢，變化於魏晉，定型於南北朝，興盛於隋唐，經宋元明清發展，至民國仍然行用。墓誌作為銘刻文物，藝術價值頗大。北魏的墓誌，隸楷合一，書法雄勁，在我國書法史上號稱「魏碑體」。定型後的墓誌，蓋石盃頂、四殺等處雕飾人物、四象、花草、雲氣等圖案，成為更加精美的藝術品。而墓誌作為原始文獻，學術價值則更大。在傳世文獻不足的情況下，利用墓誌這種原始文獻研究歷史，曾取得豐碩的成果。因此，墓誌一直深受學者的重視。墓誌的收集整理，早在北宋就開其風氣。清及民國，金石學方興未艾，其風愈扇。新中國成立後，隨着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墓誌的出土更不斷增多。可惜材料都非常分散，研究者查檢十分不便。本單位決定從事歷代墓誌的整理與研究，正是希望給研

究者提供方便。

根據最初的設想，歷代墓誌的整理與研究，分為二個系列：

一個系列為傳世墓誌的整理與研究。這項工作動手較早。一九八二年春，本單位獲悉，周紹良先生家藏唐代墓誌拓片甚多，且大部分作了釋文，便決定與周紹良先生合作，進行增補，先整理《唐代墓誌匯編》。本單位特聘周紹良先生為主編，並斥資另聘北京圖書館退休專家王敏先生協助工作。本單位為此書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經過十年，此書纔終於出版。但其餘各朝墓誌匯編，却因此書的難產而拖了下來。現在，本單位仍準備將這個系列繼續進行下去。

另一個系列即為新中國出土墓誌的整理與研究。這項工作動手也較早。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國家文物局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文化廳（局、文物局）下達專門文件（八三文物字第六四三號），要求各地有關單位與本單位合作，編集《新中國出土墓誌》（當時名為《建國以來全國出土墓誌合集》）。當時考慮比較簡單，希望一九八五年開始交稿，五年內全部完成。但在本單位有關人員親赴全國各地進行調查之後，感到實際情況很複雜。首先，不少地方缺乏專門經費，需要本單位資助。其次，不少地方缺乏專門人員（如有經驗的拓工及攝影師），需要本單位協助。而本單位的經費和人員都有限，祇能資助或協助某些特別困難的地方。為此感到，需要調整節奏，分清輕重緩急。於是，擬先以新出墓誌最多的河南、陝西二省為試點，然後逐步展開。但由於人員少，事務多，進展仍很緩慢。其間又出現一稿二用等情況，使本單位蒙受重大損失。一九九二年，本單位加強了這項工作的領導，使其逐漸走上正軌。一九九九年，本項目在國家文物局領導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又得到財政部的專項資助，出版問題基本解決。當然，困難還很不少。但在國家文物局的領導下，在全國各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單位的支持下，相信一定能夠克服困難，順利完成這部大型叢書的編集工作。

在此，謹向所有關心、支持本項目工作的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謝！

編輯凡例

一、本書是在國家文物局統一領導下，由全國各省、市文博考古及古籍整理單位合作編集的大型墓誌叢書。擬收錄自公元一九四九年以來國內出土的歷代墓誌。凡一九四九年以前已有拓本流傳，或已在金石、考古文獻中著錄者，均不再錄入。

二、本書收錄墓誌的年代，上自秦漢，下迄民國初年，即包括墓誌產生、流行的整個歷史時期。

三、本書資料來源包括以下三種情況：

(一) 經各級文物考古單位科學發掘出土者。

(二) 非經科學發掘，但出土時間、地點明確的徵集品。

(三) 原流散於民間，出土時間、地點不明，但未曾著錄發表者。

四、本書著錄以省、直轄市為單位，每省墓誌根據現存數量輯錄為一冊至若干冊。一般以四〇〇件以上為一冊。墓誌數量較少的省，可以數省合為一冊。

五、本書收錄墓誌的編排，分為兩種形式：

(一) 按年代排列。即在一省範圍內，按全部墓誌年代先後進行排列。為便於檢索，另按地域編製檢索表，附於書後。

(二) 按地域排列。即依照墓誌現存地點，分地、市、縣著錄。在各地、市、縣內再依年代先後排列。為便於檢索，另按年代編製檢索表，附於書後。

六、本書著錄墓誌，包括說明、圖版、錄文等幾部分。說明包括：名稱（首題）、年代、尺寸、形制、紋飾、書體、行數、字數及出土時間、地點、收藏處等項。圖版包括刻石拓本圖版和寫磚照相圖版。錄文採用通行繁體字，並加標點。其中異體字徑改為通行字，假借字及現在仍通行的簡體字則照錄原文。缺字用□表示，不詳字數的缺文用□表示。原表敬空格，錄文均僅空一格。為保存原誌文的行款，錄文每行後用「號加以區別。

七、少量殘泐漫漶的墓誌，由於文字無法辨識，本書僅錄名稱，附加簡要說明。

八、各省分冊後，附錄該冊墓誌人名索引。

前言

趙跟喜

墓誌之作，意在傳世，其淵淵演延，承替有序。先碑而誌，由長及方，迨至北魏，漸成定制，隋唐年間，尤風尚一時。墓多有誌，附置於穴中，一從幽壤，便千載不聞。其可貴者，在於石刻非同紙帛，久藏地下，不致損壞，亦無腐蝕之虞；一旦出土，文字燦然如初，歷歷在目，所記人事、書法、紋飾，皆成珍貴資料，遂為史家及文物家所重視。

墓誌出土原因甚多，初則置之民間田舍，繼而流於市井商販，或拓拍文字，傳抄翻印，或揣度摹寫，研討治學。其作用誠如清人朱士端《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叙》所云：「金石之功大矣哉！可以考經籍史傳，可以溯古籀篆隸，可以徵詰訓聲音，可以通文字假借，可以識冠服器用，可以推年月支干，可以訪山川地輿，可以補官爵姓氏，可以稽禮儀兵制，可以吊忠孝隱逸，可以鑒禍亂權奸，可以存遺編剩稿，可以博佛書釋典。」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宋代以降，石刻研究，大家輩出，著述豐碩，地位顯著。新中國成立，以迄於今，成就亦極斐然。

墓誌出土最多者，當屬河洛地區。洛陽地處中原腹地，有「九朝古都」之稱，自東漢晉魏以迄隋唐宋明，皆人文薈萃之地。城北邙山東西綿延百餘公里，雄渾逶迤，土厚水低，宜於殯葬。東漢及北魏王侯公卿多葬於此。歷代名門望族、縉紳百姓亦皆迷信邙山為風水寶地，甚至有殞於江南塞北者，臨終還要囑其子孫，不遠千里，還葬北邙。所謂「生在蘇杭，葬於北邙」之說，蓋源於此。以致「北邙山頭少閑土，儘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唐王建《北邙行》）。唐時北邙墓地之金貴，墓冢之堆累，叢集難覓，已「無卧牛之地」。

古人厚葬，極盡奢靡，金銀器物殉葬甚多，以致盜墓之風盛行，歷代不衰。掘墓入室者，先金銀珠寶，後三彩冥物，劫掠淨盡，笨重之誌石則少人問津，偶有出土者，亦移作民用。或以捶布洗衣，或作井沿踏步，或鑿為桌凳，或修築溝渠，或砌牆填基鋪設道路，或墊以門樞壘之戶牖。至清末修建隴海鐵路，取綫邙山南麓，挖掘墓葬許多，所出墓誌皆棄而不用，百姓人家，隨處可見。可惜無人搜集整理，任憑毀棄。

清末民初，曾有羅振玉、端方等收集邙洛誌石。編輯成書者有羅氏《邙洛塚墓遺文》，端氏《陶齋藏石記》等。三十年代初，于右任、李根源、張鈞、馬衡等，開始先後在洛陽訪購歷代誌石，主要搜集北魏、隋唐墓誌，收獲頗豐。這是二十世紀前期洛陽一次較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徵集。除李根源「曲石精廬」藏河洛出土唐誌九十三方外，還有于右任「鴛鴦七誌齋」藏誌近三百方。其中，收藏最多者為洛陽新安張鈞。張鈞與于右任曾同領陝西靖國軍，相傳二人當時友情篤厚，便議定所集誌石，魏碑及隋誌歸于氏，唐誌歸張鈞。于氏所藏碑誌，其中魏誌近一百四十方，隋誌近百一十方，皆出自洛陽，唐誌僅三十餘方，且大部分為宮人墓誌，可見傳言不虛。

洛陽歷代出土墓誌計有萬方之多，「曲石精廬」藏唐誌現存南京博物院，「鴛鴦七誌齋」藏誌現存西安碑林，其餘散存洛陽古代石刻藝術館、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師範學院、開封市博物館等處。散佚各地以至流失海外者，已無從查考。而收藏墓誌最具規模者，當屬洛陽新安千唐誌齋。千唐誌齋之創建，功歸張鈞先生。

張鈞，字伯英，號友石老人。清末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是辛亥革命時陝西新軍起義的主要策動者之一。孫中山發動「護法」運動時，張鈞為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路軍總指揮，河南省代理主席及民政、建設廳長等職。一九四九年在四川成都起義，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一九六六年病逝於北京。張鈞先生生前酷愛金石書畫，曾與于右任、章炳麟、王廣慶等交往甚密。尤其在于右任的影響下，於一九三一年開始在洛陽廣泛收集歷代墓誌，兼及碑碣、石雕等，陸續運至故里新安鐵門鎮，在其公館後花園「蟄廬」西隅，辟地建齋，獨立院落，為一廊廡三天井十五孔磚砌窯洞。建築同時，將所得誌石鑲嵌於窯洞及天井、走廊內外壁上，排列成行，琳琅奪目，伸手能觸，俯仰可視。並由王廣慶命名為「千唐誌齋」。王廣慶字宏先，新安人，早年參加同盟會，自辛亥西安起義後，一直追隨張鈞參贊戎機，曾師章炳麟治訓誥小學，抗戰期間曾任河南大學校長。張鈞建齋期間，王以師生之誼，即請章氏題寫齋名。章炳麟遂以古篆書之，並在尾部綴跋語云：「新安張伯英，得唐人墓誌千片，因以名齋，屬章炳麟書之。」張鈞倩工鐫於石上，鑲嵌於窯洞門楣正中。遂使千唐誌齋成為我國墓誌最集中藏地之一，且規模宏大，既藏且展，風格獨特。後疊經變亂，因與建築連結一體，免遭損毀，實屬萬幸。

千唐誌齋所處「蟄廬」，為張鈞私人花園。一九二一年，張鈞因父喪，由靖國軍返回故里鐵門鎮。守制期間，在鎮之西北角購置土地近百畝，辟為花園，植奇花異木，構山水水泉。歷時兩年，初具規模，使之與其公館相連接。同時，於花園西隅築千唐誌齋。一九二三年秋九月，適逢康有為游陝過豫，被張鈞迎至園中，在「聽香讀書之室」賞帖論畫，相叙惻誠。康氏乘興揮毫，為蟄廬題額、贈聯、賦詩、書跋，遂使園林燦然生色。十年後，千唐誌齋築就「蟄廬」西

隅，墓誌碑碣入藏其中，更使園林藏珍納萃，自然典雅，相得益彰。

據一九三五年郭玉堂編次，王廣慶覈定，西泠印社印行的《千唐誌齋藏石目錄》載，張鈞共收藏各種誌石一千五百七十八件。其中，未鑲嵌於壁間者，皆散置園內，歲月悠悠，人去園空，散失幾盡。尤其近百件不易鑲嵌之墓誌蓋，皆蕩然無存。所幸近年在鎮中陸續發現並回收了數十件誌石、碑碣、造像等。九十年代初，維修齋室時，又在其左側廊柱正面發現被塗抹牆內的六方唐誌。現千唐誌齋共存張鈞所收各類石刻一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西晉誌一件，北魏誌二件，隋誌二件，唐誌一千一百九十一件，五代誌二十二件，宋誌八十八件，元誌一件，明誌三十件，清誌二件，民國誌七件。此外尚存有墓誌蓋二十四件並各類書法、繪畫、造像、經幢、碑碣等六十三件。

張鈞在洛收藏碑誌，碑帖商郭玉堂功不可沒。郭玉堂字翰臣，洛陽孟津劉坡人。民國年間在洛陽經營碑帖字畫，收售碑誌拓片，常奔走於鄉野之間，採訪拓印出土墓誌，記錄甚豐。郭氏曾有《千唐誌齋藏石文集》三十卷及《洛陽偽造墓誌》、《洛陽訪古記》等手稿遺世，惜未予刊行。一九三九年輯有《洛陽近年石刻出土時地記》手稿，並由王廣慶校錄作序，一九四一年由洛陽大華書報社出版時，定名為《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此書記錄漢至隋各類石刻共計四百八十件（其中一件重複，實為四百七十九件），受到石刻研究者的重視。一九三〇年前後，郭玉堂受張鈞委託，代為收購墓誌，先集中於洛陽火車站，後轉運至鐵門鎮。當時在張鈞花園內負責建築施工者為孟津人吳樹德。吳為張鈞管家，「蟄廬」及千唐誌齋內所藏歷代名家書畫手迹及章太炎、康有為、于右任、吳昌碩墨迹皆由其收藏，後焚毀於「文革」中，殊為可惜。千唐誌齋修建期間，張鈞即請拓工將全部誌石拓片一百套，除張鈞饋送要人朋友大半外，其餘均歸郭玉堂出售。未售部分，郭氏於建國後連同家藏各種拓本一起，全都捐獻了國家。

千唐誌齋藏誌分為張鈞舊藏及近年新藏兩類。舊藏唐人墓誌，從李淵、李世民父子的武德、貞觀起，歷開元、天寶之世，以迄晚唐的天復、天祐，包括武則天的周紀、安祿山的僭號等，歷二百八十餘年，年號一貫，所缺無幾。考誌主身份，既有相國太尉、刺史太守，又有雄據一方的藩鎮大吏、官卑職微的尉丞參軍，還有名流處士，寺觀僧道，以及深鎖內宮，淒涼一生，死而不知其籍貫姓名的宮娥才女。諸如唐代《李邕墓誌》、《屈突通墓誌》、《崔玄籍墓誌》、《崔泰之墓誌》、《崔弘禮墓誌》、《賀蘭務溫墓誌》、《王冷然墓誌》、狄仁傑撰書《袁公瑜墓誌》、李德裕撰《劉致柔墓誌》、畢誠撰《盧就墓誌》、薛稷撰《王德表墓誌》、韋應物撰《李瓘墓誌》、補修國史撰寫唐曆的柳芳撰《源光乘墓誌》、高麗人《高玄墓誌》、女道士《馬凌虛墓誌》、鍾紹京妻《許氏墓誌》、崔祐甫之姊《崔嚴愛墓誌》、嗣曹王《李臯墓誌》、李邕子《李翹墓誌》、李邕孫《李正卿墓誌》、家奴《吳孝恭墓誌》、酷吏《周利貞墓誌》。還有五代《西方鄴墓

誌》、《趙鳳墓誌》；宋《苻彥琳墓誌》、《吳元載墓誌》，楊億撰《范貽孫墓誌》，著有《琬琰集》百卷的王貽慶的墓誌，以及著述頗豐的魏孝孫的墓誌等。此外，一些名不見經傳的誌主，其墓誌所記人物故事，對唐代一些重大事件多有涉及。如舊藏誌中共有武則天大周時期墓誌一百四十餘方，其中《程思義墓誌》、《賀蘭務溫墓誌》對研究武氏重用酷吏之事至為有用。而董懷義、許氏、白知禮、李懷等人墓誌則記述了武則天之後一系列宮廷政變的情況。記錄安史之亂的則有馬凌虛、崔嚴愛、臧曄等墓誌。而李臯、陳皆、鄭濂等人墓誌則對唐王朝征討叛亂活動記述較多。凡此種種，涉及唐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地望、民俗、喪葬禮制等諸多方面。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史家、學者依千唐誌齋舊藏誌石內容，探蹟索隱，鈎沈稽遠，可謂曲徑通幽，別開生面，著述文章，成果纍纍，對史學研究之推動，為功甚偉。而書家對誌石書法之推重，繼康有為等崇尚北碑之後，亦有過之而無不及。

千唐誌齋舊藏墓誌，一九八三年曾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名為《千唐誌齋藏誌》，上下兩冊，全為拓片圖版，附以簡介。一九八九年再版時，綴補周紹良先生重印後記。該書所收誌石共一千三百六十七件，較一九三五年郭玉堂編次、西泠印社印行之《千唐誌齋藏石目錄》缺二百一十一件，較一九五三年張鈞自編《千唐誌齋藏石目錄》缺一百二十五件（張鈞編著此目所依八百餘份拓本，後來悉數捐贈中國歷史博物館）。比千唐誌齋現存誌石多二件。但所錄誌石與現存誌石目錄有異，或錄入時石已無存，或石有存而未錄入。拓片大部為郭玉堂先生原藏舊拓，舊拓質量較差，捶拓不勻且多未觸及邊緣。所缺部分由千唐誌齋補拓錄入，因誌石鑲嵌壁上，位於牆角一面亦不能拓全，有礙閱讀，此為遺憾之一。簡介所注誌石尺寸皆依拓片量定，故與誌石尺寸均有誤差。最大遺憾是沒有錄文，不便引用。雖千唐誌齋研究人員耗費多年精力，將誌文全部抄錄標點，但因條件限制，未能付梓。一九九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紹良先生主編的《唐代墓誌匯編》，將千唐誌齋所藏唐誌大多錄載其中。因錄文時未與原石覈對，以致部分文字漏錄或有辨識之誤。一九九四年，陝西三秦出版社陸續出版《全唐文補遺》多卷，這批唐誌錄文也散見各卷中，錄文多依《唐代墓誌匯編》，舛誤之處一併移入，大同小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因自然原因導致的水土變異、農田耕作及考古發掘等，河洛地區出土墓誌估計有五千方之多。同時，還有部分外地出土誌石流入洛陽古玩市場。這些墓誌頗多史冊有名的人物，或為誌主，或為撰文，或為書丹，或為篆蓋，或為文中涉及。如開元廿九年（七四一年）顏真卿書《唐故趙郡太原王氏（琳）墓誌銘》、天寶八年（七四九年）顏真卿撰書《唐工部尚書贈太子太師郭公（虛己）墓誌銘》、開元廿年（七三二年）張九齡撰《唐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說）墓誌銘》、天寶元年（七四二年）張旭書《唐故絳州龍門縣尉

嚴府君（仁）墓誌銘》、大和六年（八三二年）裴度撰《唐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贈司徒弘農楊公（元卿）墓誌銘》等。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藏有五百餘方，《全唐文補遺》第八輯收入大部分，一九九六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洛陽新獲墓誌》載有圖版並釋文一百八十三方。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的一百餘方，一九九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全部收入。洛陽師範學院的三百八十方，二〇〇四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載有目錄並簡介一百六十二方，圖版並考釋三十二方。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洛陽隋唐工作隊有百餘方。洛陽市屬各縣博物館及文物單位散存近百方。洛陽宋氏、劉氏、張氏、索氏、唐氏、王氏等人藏有六百餘方，北京、西安、山東等地流散千餘方。千唐誌齋新藏最多，有六百二十方，二〇〇六年陝西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收入唐誌五百二十七方，附錄北魏、北周、隋及宋、明、清墓誌五十八方，共計五百八十五方，其餘部分未及收入。

千唐誌齋新藏墓誌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至二〇〇六年二月期間所徵集。一九九四年春，洛陽拓工石庚寅在千唐誌齋談及其家孟津小良村一帶散存有石刻墓誌，多為農民填築溝渠、翻新房屋所出，大都閑置里巷庭院間。我們遂委託其子代為訪購，數月之間，竟得唐人墓誌四十餘方，且價格甚低，五十公分左右每方僅需三十元。之後，洛陽夏氏又代為徵得唐誌十方，多為新出，經略加整理，覺價值甚高，遂籌措資金，開始廣泛徵集。一九九八年秋至二〇〇二年近五年時間，先後徵得五百七十餘方，收獲頗豐。此項工作得到時任河南省省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同志的關注和支持。國家文物局充分肯定徵集工作的同時，同意立項並撥付專項經費。河南省、洛陽市、新安縣政府每年皆追加財政補貼，遂使徵集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最初徵集範圍限於孟津縣朝陽、平樂一帶，後來漸及洛陽市周邊縣區，每有信息，即奔赴查看。千唐誌齋位於洛陽西部五十公里之新安縣鐵門鎮，尋訪誌石地點皆在百餘里之外，數年之間，行程八萬公里之多。或夏日酷暑，或冰天雪地，聞訊而動，風雨無阻，奔波在村莊田野間，一旦收獲，欣喜不已，其中甘苦與艱辛，難以言述。

河洛地區是黃河文明第一道曙光升起的地方，《史記·封禪書》有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宋司馬光《過故洛陽城》詩云：「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位於伊洛河北岸的洛陽是我國建都最早，時間最長，而建都朝代最多的千年帝都。沿洛河自東向西，在不到五十公里距離內，依次為商都西亳、夏都斟鄩、漢魏故城、隋唐東都城、東周王城五座古代都城遺址，圍繞這些遺址的文化遺存星羅棋佈，洛陽城北邙山「起自河口，西逾平陰」，東西連綿近二百餘里。而由偃師首陽山迤邐向西長約三十公里，由洛陽至黃河之間寬約十五公里的邙山地段，皆為墓葬

叢集之地，西周王室貴族、東漢帝陵、曹魏、西晉以及北魏王陵皆在其間。

北魏自代遷洛，推行漢化。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四九五年），詔令：「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魏書·孝文帝紀》）「自茲厥後，悉可歸骸邱嶺，皆不得就塋恒代。」（《魏書·廣川王略附子諧傳》）於是代人南遷者，無論元氏宗室、貴族勳舊，還是餘部諸姓、士兵百姓，皆改為洛陽人，並皆卒葬北邱。為使後人易於辨識塋域，多刻制墓誌，附葬地下。至唐，刻誌之風盛行，籍屬河南者死後要歸附先塋合葬邱山，貫隸他鄉者也要卜擇新塋安神北邱。以致北邱塋域連接，楸柏蔥鬱，甚至有世代湮滅，墓穴重鑿而疊壓者。正如唐王建《北邱行》所云：「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洛陽唐人墓葬，不僅叢集北邱，邱山之陽，田陌之間，以唐東都城為中心，向東扇形幅射之數百平方公里間，亦冢墓相連。此外，洛陽城南之萬安山、龍門山亦是世家豪族擇葬之地。

千唐誌齋新藏墓誌大多收集於北邱山、萬安山、龍門山三處。其中徵集於邱山一帶二百四十餘方，徵集於萬安山一帶二百二十餘方，徵集於龍門山張溝一帶七十餘方，徵集於洛陽豫深文博城近一百方。其餘皆零星徵集於洛陽郊縣地區，部分為收藏者和農民運送或捐獻。

北邱為帝陵所在，古冢累累。據統計：一九一三年為七百九十一座，一九六六年減至五百五十五座，至一九八六年尚有三百六十七座。灑河由北向南注入洛河，東漢陵區位於河東，北魏陵區位於河西，達官顯要墓地雜置其間。這些墓葬無論大小，經年歷代，多被挖掘；民國前後，盜掘更甚，幾乎十墓九空。當地人對墓葬族屬相當清楚。千唐誌齋新藏北邱所出墓誌大都徵集於孟津平樂、朝陽、送莊附近。如袁守一撰《大周故中大夫行司禮寺恭陵署令袁府君（公瑤）墓誌銘》，公瑤為唐相州刺史袁公瑜之弟。袁公瑜墓誌為狄仁傑撰書，該誌早年已被張鈞收存，現藏千唐誌齋。袁公瑜墓誌載其葬於洛陽縣之北邱山。公瑤墓誌載其「卒於恭陵公舍」，後「轉葬河南北山」，即北邱山。該誌一九九九年四月出土，千唐誌齋徵集。又如韓休撰《大唐故吏部侍郎高陽許公（杲）墓誌銘》，許杲即許景先，誌主並撰文者兩《唐書》皆有傳，舊傳載：「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也。』」該誌二〇〇二年漢魏故城東首陽山出土，千唐誌齋徵集。又如鄭虔撰《大唐故右千牛衛中郎將王府君（暄）墓誌銘》，一九九九年孟津朝陽出土，千唐誌齋徵集。鄭虔為其從弟鄭仁穎所撰墓誌，早年被張鈞收存，亦藏千唐誌齋。又如韋承慶撰《大周故鎮軍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贈幽州都督上柱國柳城郡開國公高（質）墓誌銘》，尤為稀罕。高

宗顯慶五年（六六〇年），唐將蘇定方破百濟國，虜扶餘義慈及太子隆等五十八人至洛。不久，扶餘義慈卒，詔葬洛陽邙山。邙山鳳凰臺村北一帶，有「亡國之君」墓地之稱。在此先後出土有百濟人扶餘義慈、扶餘隆、黑齒常之、黑齒俊、泉南生等十餘方墓誌。總章元年（六六八年）九月，唐將李勣引兵破高麗，十二月，俘其王高藏等以獻，總章二年五月，徙高麗戶三萬於江淮、山南。高質即於此時「携率昆季，歸款聖朝」。該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呂廟村西北即鳳凰臺附近出土，誌載其為「遼東朝鮮人」，千唐誌齋遂徵集收藏。千唐誌齋舊藏《大周冠軍大將軍左韜衛翊府中郎將高府君（玄）墓誌銘》，誌載其為「遼東三韓人」，高宗時隨泉南生入唐，亦卒葬邙山。高質墓誌的出土，為百濟人卒葬洛陽再添新證。又如著名詩人王之渙堂弟之咸及之咸第五子綰等墓誌的出土，對研究之渙家族卒葬洛陽大有幫助。之渙、之咸祖父德表即卒葬洛陽，洛陽為之渙家族祖塋所在。洛陽先後有德表及其妻，德表子洛客，孫之渙、之咸，曾孫綰等八方墓誌出土。除洛客墓誌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之渙墓誌早年出土現藏南京博物院外，其餘六方皆現藏千唐誌齋。又蘇珽撰《仙州刺史衡守直墓誌銘》、李吉甫撰《裴虬夫人崔氏墓誌銘》，包佶撰《盛王府司馬張懷環墓誌銘》，以及屈突通子屈突詮、孫屈突琬、孫女婿楊東魯等墓誌，千唐誌齋皆陸續徵集收藏。屈突通及其妻蔣國夫人、孫屈突伯起三方墓誌舊藏千唐誌齋。此外，屈突通孫屈突季札墓誌一九九一年也於此地出土，現藏河南省博物院。據聞屈突通父屈突長卿墓誌亦已出土，但去向不明，無可考證。

萬安山位於洛陽南伊水東岸，自伊闕東行十餘公里，即可見萬安山唐墓叢葬之地。萬安山自西而東延緩百里與嵩山連接，山北峭岩陡立，山南為平緩黃土坡地，一溜排開四座山頭為黃瓜山、馬山寨、鐵樞山、椅子山。宋人范仲淹墓地（當地稱范墳）即在此臺地上，古柏森森，墳域樸然。范仲淹墓南為許營村（當地人稱下營，營乃塋之變稱），相傳舊時有上、下塋之說。居民多為范姓。村南為曲水河，潺緩西流。唐時這裏為李、盧、鄭、崔、裴、姚、王等名門望族塋地。墓塚累累，碑碣聳峙。唐名相姚崇、張說皆葬於此。今臺地空曠，蕩然無物，僅存唐鄂州刺史盧正道神道碑、光祿少卿姚崇神道碑、商州刺史韓國公裴延慶（當地稱裴狀元）碑。近年萬安山出土墓誌五百餘方，半數為千唐誌齋徵集，部分為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收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張說墓誌即出土於范仲淹墓東南兩公里袁莊村一磚廠內。

萬安山墓地唐時多葬官宦世家，清末以來，不斷有墓誌出土。筆者走訪時，曾在當地楊營一農戶家見一方唐誌，闊及一米，置於院中地上，可惜因捶布洗衣，石面漫漶，文字已湮滅難辨。據說該墓挖掘時，穴中寬闊如農家場院，用馬車入內拉運隨葬器物，尚能調頭周旋。萬安山因地域稍偏，新中國成立前墓碑碣被毀掘程度輕於北邙山，二十

世紀五十年代尚有許多唐宋碑碣石儀矗立田間陌上。由於世代口碑相傳，當地居民對兆域分佈異常熟悉。雖地上無物可辯，仍然能詳指細點歷代人物之墳塋歸屬。

唐代名相姚崇家族兆域，在萬安山柏樹溝村西。二〇〇一年三月，因農民澆地，地面塌陷，姚崇父姚懿墓誌遂被發現，其墓穴早年曾被盜掘，墓室空無一物，僅有墓誌一合，同時出土墓門一套，門扇上綫刻仕人圖像栩栩如生。墓誌四沿為神獸並纏枝紋飾，製作精美。姚懿其人此前已有神道碑序並玄堂記文字可考，姚懿墓誌出土對研究姚崇家族及世系爵里至為重要。在萬安山徵集姚懿墓誌的同時，還徵集到元佑撰徐放、楊發撰放妻元氏墓誌二方。元佑史籍有載，楊發兩《唐書》有傳。據誌文可知，楊發妻為元佑之妹。徐放元和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卒於衢州官舍，其妻元氏「護喪止居於吳，遂返葬於洛，往而復者，凡里九千有餘」，可謂長途跋涉。近年新徵萬安山出土唐誌，較為有名者，還有宰相張錫墓誌、詩人邵昞墓誌、盧載與妻鄭氏墓誌，以及徐浩撰崔藏之墓誌、崔倣撰崔渾之墓誌、王建撰李仲昌墓誌、鄭熏撰皇甫鉉墓誌，等等。

千唐誌齋新藏墓誌徵集過程中，每方誌石筆者必親歷之，聞訊乘輿而往，得之欣喜若狂。萬安山道路崎嶇，每顛簸鄉間土徑，但見葱綠一片，無迹可尋。難以想象這片黃土地下竟安息着無數安邦定國之勳臣，詩禮簪纓之名族。每見新誌，小心拭去塵泥，誦讀文字，許多誌主及撰文、書丹、篆蓋者，在史籍中皆有著錄，如對故友舊人，頓覺溫馨拂面，驚喜之狀非親歷者所能體味。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筆者在許營一農家中見一宋誌，因徵集時唐以后墓誌基本不收，未予注意，不經意間讀到「文正公」、「寶文公」字樣，始知為范仲淹妻馮翊郡太君張氏墓誌。該誌形體闊大，九十二公分見方，叙事甚詳。撰文為資政殿學士李清臣，書者為中大夫充寶文閣待制、開封府兼畿內勸農使韓宗道，篆蓋為尚書吏部侍郎彭汝礪。經詢問得知，墓誌出土地點在范仲淹墓園東側三里處，因地面塌陷得見，遂追詢墓誌蓋下落，不幾日亦得之。可惜因厚重搬運不易，已被一分為二。張氏何以葬在范園之外，不得而知。張氏墓誌載其為錢塘人，歸文正公凡二十年。范仲淹卒時，其子純粹（即寶文公）僅七歲，而後却能「克承厥美，昌大於後，與其伯仲同時立於朝，由夫人教諭有法」。張氏墓誌記范仲淹父子行迹甚詳，對研究范氏家族及其生前身後人事遷變意義重大。又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初，在萬安山西南楊營村徵集到蘇氏父子蘇澄、蘇子才墓誌並蘇澄妻李靚儀、蘇子才妻韓氏墓誌四方。蘇澄墓誌為范仲淹子純仁撰，李氏墓誌為李德芻撰。蘇子才夫妻二誌均為承議郎、雲騎尉趙伾撰。誌主及撰文、書丹、篆蓋者，多見於《宋史》，頗有價值。尤其對研究北宋詞人蘇舜欽（字子美）世系大有裨益。蘇舜欽弟兄三人：舜元、舜欽、舜賓，俱以能文章、善草隸而得名。蘇澄為舜賓子。蘇澄有子三人：之純、之才、之武，之才為次子。

洛陽所出北宋墓誌皆碩大厚重，製作精細。萬安山出土宋誌不多，范仲淹妻張氏墓誌並蘇氏家族墓誌堪為宋誌典範。

龍門山位於洛陽城之南，伊水中流，兩岸山峰對峙如闕。東為香山寺，有唐大詩人白居易墓，西為世界文化遺產——龍門石窟。龍門山石窟毗連，翠柏如蓋，向西五里許即張溝村。張溝村位於丘壑綿延的黃土嶺地之間，這裏是隋唐叢葬墓地之一，多有皇親國戚及世宦顯貴墓誌出土。徐嶠夫妻墓誌即出於此。徐嶠妻王琳墓誌為顏真卿所書。兩誌皆近九十公分見方，堪為國之瓌寶。由於龍門佛緣所繫，這裏也是僧尼塔幢薈聚之地。千唐誌齋新藏四方僧人所撰墓誌，其中三方為該地出土，即：福先寺沙門至辯撰李弘墓誌，李弘葬於定鼎南龍門甫天竺寺東南三百餘步。沙門湛然撰李鴨墓誌，李鴨葬於河南龍門鄉平原。僧清江撰安國寺清源律師墓誌，清源葬於龍門之西嶺。清江乃中唐時著名詩僧，與清源同學。清源俗姓嚴，祖挺之，中書侍郎，兩《唐書》有傳；父武，黃門侍郎，肅、代時期名藩。清源高門貴裔，却厭世信佛，受法於東都安國寺，二十八卒於該寺。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筆者在龍門北廣化寺一農民家中得見此誌，高寬不及四十公分，順車携回。後得知清江、清源二人皆見於僧傳，於史有補，頗有遺珠重揀之感。另有修行寺尼報恩、遍照與安國寺尼隱超墓誌三方。報恩為工部尚書齊國公崔從禮少女，將作大匠宋國公宗晉卿之妻，宋公亡，便歸釋教，歷四十餘年而卒，葬於龍門南原。隱超俗姓李，元兄洛陽尉曜，中書舍人玄成、楚州刺史湯乃其侄。隱超為安國寺主大德禪師比丘尼，深入禪門四十五載，葬天竺寺之南原。遍照禪師墓誌為戴宗亮撰。遍照俗姓段，卒葬龍門寶應寺。其誌蓋為磚質，亦於廣化寺徵集。由此可知唐僧尼身世之駁雜。二〇〇〇年三月龍門張溝村北出土李君夫人雲氏墓誌載雲氏將終，希望死後「旦暮得聞鐘梵之音。」其子珣乃建塔於龍門之原，「東北去廣化寺五十步，西北去護法寺二百步，南去元憲寺二百步，西去寶應寺百步」。二百餘步之內，四寺相望。唐時龍門西原寺院毗鄰，塔幢林立之景象由此可見。在龍門廣化寺附近村莊徵集墓誌過程中，不時見到一些僧尼墓誌，但為經濟條件所限，對此類誌石未予徵集，殊覺遺憾。又龍門廣化寺西北出有李氏、武氏宗室墓誌數方，千唐誌齋徵集兩方。其中，許王第九子李璉墓誌係於廣化寺西北出土，偶然得之。唐垂拱四年至永昌元年（六八八—六八九年），武則天以謀反罪連誅李氏宗親數十人。之後，高宗第四子許王李素節並三子澤王李上金也皆因謀反罪被縊死。素節子九人、上金子七人同被誅殺。《新唐書·許王素節傳》云：「（素節）與上金同迫逮赴都，……至龍門驛被縊，……葬以庶人禮，子瑛等九人被誅。」素節九子被殺何地，歸葬何處，墓園在何方位，史籍無載，遂成千古之謎。李璉為許王第九子。該誌指示被殺之地云：「則天臨朝，王室有否，國事遷鼎，家丁覆巢。天授中，君與諸昆八人，僉被殛於舒州之地，享年十五。」又指示歸葬之處云：「永遷窆於河南府龍門鄉之平原，從吉兆也。九隧相封，千秋永終。」並指示墓園方位云：「出帝城兮